

如何处理当代史研究的价值关怀

——以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关系研究为中心的考察

张秀莉

前后两个30年关系研究，不仅是关乎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问题，也是中国当代史研究领域的重大理论问题，只有从史实上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的历史脉络、因果关系研究透彻，才能从理论上阐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前后两个30年关系的研究是中国当代史研究必须首先关注的重大理论前沿问题。

—

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30年，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发展的最重要时期。如何认识二者关系，成为人们深入理解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节性难点。中共中央对两个30年关系的基本结论是肯定的一贯的。

1981年6月27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央对前30年的全面总结和客观评价，决议从10个方面总结了建国32年取得的主要成就，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这一时期出现过“文革”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但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和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⁴⁰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创造性地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实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赋予民族复兴新的强大生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出灿烂的前景。”⁴¹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

⁴⁰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63-67页。

⁴¹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11/17/content_693542.htm

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⁴²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深刻论述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明确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中央关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关系的结论肯定了两者既有历史递进性，更有内在统一性，前30年为后30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提供了直接理论来源和历史经验借鉴，后30年是对前30年的丰富、发展与完善。

“两个不能否定”这一命题直接涉及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党执政根基的巩固、全党全国人民思想的凝聚统一等一系列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问题，必须从政治高度深入认识其重大意义。朱佳木（2009，2013）认为以唯物史观和史实研究为基础，辨明改革开放前后历史的关系，具有“护国”的功能。当前，一些人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总是喜欢拿历史尤其是国史作文章，采取夸大事实、以偏概全、偷换背景、捕风捉影、胡编滥造、耸人听闻等手法，竭力歪曲、丑化、伪造、诬蔑、攻击新中国的历史。对此，我们一方面要理直气壮地用事实予以抵制和批驳，以维护共和国的利益和荣誉；另一方面，要大力加强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国史研究，在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年学生中开展国史教育，普及国史知识，把正确认识和解释国史纳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工作中去，用以树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坚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心和信心。⁴³

二

从近些年来民情民意的反映、国内外学术界、理论界、新闻媒体的议论看，人们对两个30年的历史及其相互关系的研讨分歧较大。这些分歧有的是学术上的

⁴²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人民网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6429094.html>

⁴³ 朱佳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朱佳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统一》，《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年第3期。

不同观点，有的是思想认识上的差异，还有的是政治立场上的对立，也有个别人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有意或无意中夸大事实。

学术界对前后30年关系的研究也经历了一个争论与探索的过程。很多人在强调中国经济改革高度成功的时候，总是隐含着对前30年的否定，似乎只有全面否定前30年才能够解释后30年中国的改革成功。有人认为“在前30年中，我们关起门来搞了那么多的政治运动，无限地夸大阶级矛盾；我们根据书本和苏联的示范，认定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把我们导入误区，严重地妨碍了我们进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可以说，在这个年代里，我国的经济实际成了‘运动经济’、‘命令经济’，把国民经济搞到几乎崩溃的边沿。……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文革’再搞下去，真有亡党亡国的危险！”⁴⁴另一方面，有些人在批评目前改革出现的种种问题时，又走向用前30年来否定后30年的倾向。除了由来已久的“对立否定论”，还出现了“直线运动论”、“一概否定论”、“整体论”等争论性观点。⁴⁵近年来也有学者对“直线运动论”的实质进行了批判，指出：“直线运动论”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是两个30年的叠加，“在肯定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成就的时候，有意无意地淡化改革开放具有革命性的意义”，⁴⁶也有学者强调：“将‘两个30年’简单地直线化，认为‘后30年’是‘前30年’的直线式发展，否认‘后30年’对‘前30年’有拨乱反正的一面，是转折性发展。”⁴⁷由这些争论可见正确认识前后两个30年关系的必要性和复杂性，每一种观点背后都蕴藏着很强的目的性和政治性。

2009年以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之际对两个30年关系的密集性讨论，引发了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广泛而深入研究，也取得了理论上的创新与突破，从研究方法而言，也不再拘泥于空泛的说教，开始重视从历史事实和实践剖析两个的关系与演进脉络。

近年来关于前后30年关系研究的重要理论创新在于前30年和后30年“整体论”中的争论。在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前后30年是一个连续的整体。前30年在曲折中为后30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提供了宝贵经验、

⁴⁴ 宋养琰：《前30年与后30年：破解“中国奇迹”》，《乡音》2008年第10期。

⁴⁵ 详见王东红：《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30年关系研究述评》，《北京党史》2013年第4期，文中对早期的几个论争性观点都有总结和提炼，此处不再赘述。

⁴⁶ 李君如：《怎样看待新中国两个30年》，《新湘评论》2009年第10期。

⁴⁷ 石仲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新中国六十年》，《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8期；《正确认识新中国发展的两个“30年”——兼谈60年的历史经验》，《北京日报》2009年6月22日，第17版。

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后30年是对前30年的纠正、继承和创造性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朱佳木（2010）对正确认识两个30年的关系做了全面的阐述，前30年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基本的物质技术条件、一定的思想保证、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必要的国际环境，后30年是对前30年的超越。但后30年并没有离开社会主义的轨道，而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因此，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或者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都是错误的。⁴⁸石红聚、张彬（2009）认为两个30年是一个过程的两个阶段：前30年为后30年奠定基础，提供经验和教训，后30年是对前30年的继承、校正、发展和创新。两个30年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阶段，否认任何一个30年都是对历史的阉割。⁴⁹叶志坚（2009）提出前后30年探索成果分别体现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无论是毛泽东思想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们既前后相连、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发展创新，体现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勇气。“第一个30年”的毛泽东思想，为“第二个30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基础。“第二个30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第一个30年”的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发展。⁵⁰赵明（2009）认为前30年为后30年奠定了牢固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基础，后30年是对前30年的扬弃和创新。没有前30年的积淀，就没有后30年的高速发展；没有后30年的辉煌，前30年的经验就得不到延续发展。任何把前30年和后30年对立、割裂起来的看法，都是不合乎客观实际的。⁵¹

但在整体论的观点中也存在一些争议性的理论难题。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否为前后 30 年划分了历史界限

这一难题主要涉及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分期。一种观点认为，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是中国近代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至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现代史，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是中国当代历史。⁵²这种观点主要是为了强调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并且认为由于中国社会性质在中国建立以后基本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简单地套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或“历史分期”理论在中

⁴⁸ 朱佳木：《正确认识新中国两个 30 年的关系》，《前线》2010 年第 3 期。

⁴⁹ 石红聚、张彬：《前 30 年艰辛探索，后 30 年突破创新》，《北京社会科学》2009 年第 5 期。

⁵⁰ 叶志坚：《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两个 30 年”》，人民网，2009 年 11 月 17 日。

⁵¹ 赵明：《正确认识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关系》，《农村经营管理》2009 年第 11 期。

⁵² 石仲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什么不包括毛泽东思想》，《河南日报》2007 年 11 月 13 日。

国当代历史上没有实际意义。另一种观点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历史新时期的标志,但前后30年是一个整体,都属于内涵一致的中国现代史或中国当代史,将其作为当代中国史的时限划分则会陷入“理论陷阱”。表面上似乎抬高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地位,然而会导致否定三中全会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社会形态的根本一致性,把改革开放前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加以割裂和对立。⁵³尽管在学界以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主要任务或工作重心等的发展和变化作为历史分期关节点选择的标准越来越有共识,但如何既肯定改革开放的巨大革命性,又说明前30年是后30年的基础和准备,后30年是前30年的扬弃和完善,并将两者有机统一起来,还需加强研究。

二、前后两个30年是否各有逻辑或模式

研究此一问题的部分学者认为,前后30年“既有理论与实践的本质差异,又有继承与发展的本质联系的辩证统一关系”。⁵⁴就其差别来讲,如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计划经济主导转向市场经济取向。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是其主线,前后30年并不属于不同的发展逻辑。有人认为“新中国60年来,我们党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发展的,主要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建设性功能”。⁵⁵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最早由毛泽东提出要创造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之后邓小平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江泽民提出各项事业相互协调和全面发展模式,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新发展模式,习近平提出“四个全面”发展模式。可见,形成于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模式是继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

但有些学者认为前后30年有不同的内在逻辑,形成了较为迥异的社会模式。有学者将前30年归于“前中国模式”范畴,把后30年归于“当代中国模式”的范畴。⁵⁶有学者认为,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属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后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前3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模式是“急风骤雨”式的革命发展模式,不同于苏联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模式,仍属于传统社会主义的范畴,而后3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模式

⁵³ 朱佳木:《警惕在中国近现代历史断限问题上的“理论陷阱”》,《高校理论战线》2008年第10期。

⁵⁴ 张启华:《正确看待新中国两个30年》,《中国教育报》2009年9月15日。

⁵⁵ 卢冀宁:《时代主题转变与新中国“两个30年”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创新》,《理论学刊》2010年第3期。

⁵⁶ 朱季康:《近代以来所谓“中国模式”的历史考察与当代批判》,《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2期。

是“和风细雨”式的改革发展模式；最终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产生了不同的历史发展结果，前 30 年出现了严重挫折和巨大损失，后 30 年实现了两者的良性互动。⁵⁷刘林元（2009）指出，前 30 年以阶级斗争为纲，搞的是革命逻辑，而后 30 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的是建设逻辑。总结吸取毛泽东晚年的教训则是连接两个时代的重要纽带。⁵⁸谢林平（2009）认为应该从四个方面去看前后 30 年的历史逻辑关系，第一个认识，前 30 年是必经的、不可跳跃过去的历史阶段；第二个认识，前 30 年的发展在困难重重和波折重重的进程中仍旧取得了重大成就，初步建立了自我配套的工业体系和城市体系；第三个认识，对前 30 年的模式和做法，我们需要认真总结、深刻反思；第四个认识，后 30 年的改革发展，远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发展得最好的时期之一，近可以说是自上世纪二战以来世界范围内发展得最快的国家之一。可以说，后 30 年的改革发展正是由于汲取了前 30 年的经验和教训，才获得了发展的动能，才得以在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局势中化险为夷，比较顺利地推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⁵⁹

还有学者在比较前后 30 年时得出了一系列的差异，如“前 30 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 30 年创新了社会主义具体制度；前 30 年贡献了四项基本原则，后 30 年贡献了改革开放；前 30 年奠定了经济社会基础，后 30 年实现了科学发展；前 30 年解决了民族独立，后 30 年实现了民族富强”，即“前 30 年艰辛探索，后 30 年突破创新”。⁶⁰赵凤平（2009）认为，前 30 年是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历史征程，是建设的 30 年，而后 30 年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征程，是改革的 30 年。⁶¹还有学者把前 30 年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即在封闭半封闭状态搞建设，经济社会发展曲折乃至停滞，相当长一段时间处于思想僵化、迷信盛行的状态；而后 30 年是改革开放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实现了指导方针、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定位、发展途径、执政理念上的历史性转变。

⁵⁷ 刘志礼、魏晓文：《改革开放前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差异探析》，《兰州学刊》2008 年第 9 期。

⁵⁸ 刘林元：《两个 30 年的有机衔接——毛泽东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阅江学刊》2009 年第 2 期。

⁵⁹ 谢林平：《试论新中国 60 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兼论新中国“两个 30 年”的历史逻辑关系》，《岭南学刊》2009 年第 6 期。

⁶⁰ 石红聚、张彬：《前 30 年艰辛探索，后 30 年突破创新》，《北京社会科学》2009 年第 5 期。

⁶¹ 赵凤平：《三个 30 年：伟大的历史征程——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年之际》，《大连教育学院学报》2009 年第 4 期。

⁶²有学者认为，前 30 年“探索的是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初步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建设模式”；后 30 年“探索的是中国式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强国富民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⁶³林春（2006）认为，中国模式前有路径依赖，后有创新空间。就历史准备而言，包括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及其之后新中国的建设实践，直至改革初期的自我改进式转型，分别“以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对抗殖民化，以群众路线式动员参与对抗苏式国家官僚统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抗资本主义的全球整合”。⁶⁴陈志刚（2009）把中国的现代性模式分为三个阶段：1950-1978 年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模式的探索阶段，1978 到 2002 年是现代性模式的转轨阶段，2002 年至今是根本超越西方现代性的新阶段。⁶⁵郑杭生（2009）认为，前 30 年为后 30 年打下了基础，提出了问题，但后 30 年中的前 20 年是初级发展和旧式现代性阶段，而后 10 年是科学发展与新型现代性阶段。⁶⁶

三、从前后 30 年的关系看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

中央文件中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一种并列关系，而非包含关系。学界对此问题的观点也有较大分歧。有学者认为应将两者统一起来，否则会影响如何将 60 年看作一个整体，容易导致前后 30 年彼此割裂的误判。杜鸿林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端和初始形态。如果将毛泽东思想排除在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成了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空降物”。⁶⁷庄前生（2006）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项理论成果都“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一共同基础，因而又具有一体兼容的相互渗透关系”。因此，要把它们统一起来，不然，“不仅在称谓上甚为不便，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分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统一体系”。⁶⁸

也有学者通过两个 30 年有机衔接来论证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区别，列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七个方面的不同之处，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坚持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

⁶² 刘建民、胡涛：《新中国成立后两个 30 年比较之思考》，《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10 年第 1 期。

⁶³ 赵凌云、赵红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三个 30 年与三次历史创造》，《红旗文稿》2010 年第 5 期。

⁶⁴ 林春：《承前启后的中国模式》，《读书》2006 年第 4 期。

⁶⁵ 陈志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现代性模式的新探索》，《毛泽东思想研究》2009 年第 1 期。

⁶⁶ 郑杭生：《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转型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9 年第 2 期。

⁶⁷ 杜鸿林：《关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若干思考》，《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7 年第 1 期。

⁶⁸ 庄前生：《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的若干构想》，《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 年第 12 期。

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要缘于我们党对前 30 年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特别是对文革教训的科学总结。⁶⁹“前后两个三十年的理论探索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是一种‘前史’与‘正史’的关系。毋庸置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它形成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后三十年，是对三十年来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以理论形态再现了后三十年党领导人民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进程；但是，也不难看出，前三十年的理论探索所形成的一些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成果也在这一理论体系中得到继承和发展，前三十年理论探索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的正确的思想观点也作为一种理论因子在这一理论体系中得以体现。”⁷⁰有学者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形成的，但它是新中国 60 年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智慧结晶，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与发展。⁷¹

三

一、国史研究的代表

从国史研究的路径探讨前后 30 年的关系，不仅成为史学领域的主流观点，而且走在了此理论研究的最前沿。代表学者有朱佳木、萧冬连等。

朱佳木（2009）认为要回答什么是国史主流的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前 30 年的历史，特别是那段历史中发生的失误和错误。为此他提出必须树立以下四个观点：第一，要把失误和错误与那段历史取得的成就放在一起权衡轻重，分清主流与支流。第二，要对失误和错误进行具体分析，不能因为某些历史事件中有失误、错误就全盘否定那些事件。首先，分析失误和错误是普遍的现象，还是个别的、局部的现象。其次，失误和错误有多少就说多少，不能夸大，更不能以偏概全，把正确的合理的地方也说成是错误。再次，把犯错误和犯错误的时期加以区别，不能因为某个时期犯了错误，就把那个时期的工作统统否定。第三，要把失误和错误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把在当时可以避免的和由于客观条件限制难以避免的错误区分开来。所谓客观条件限制有两种。一种是实践不够，缺少经验。另一种是物质不够，缺少条件。第四，要分析造成失误和错误

⁶⁹ 刘林元：《两个 30 年的有机衔接——毛泽东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阅江学刊》2009 年第 2 期。

⁷⁰ 任晓伟：《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研究》，《广西社会科学》2009 年第 3 期。吴建伟：《两个三十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 12 月。

⁷¹ 荣开明：《正确认识新中国两个“30 年”的历史及其相互关系》，《学术研究》2009 年第 10 期。

的主观原因,同时也要把好心办坏事与个人专断、个人专断与专制制度加以区别。正确看待前 30 年的历史主流,还要看到那段历史对改革开放的意义,看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相互联系,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第一,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政治前提。第二,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制度基础。第三,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第四,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定的思想保证。第五,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总之,改革开放是在新中国前 30 年建设成就与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没有改革开放,前 30 年的历史难以为继,但没有前 30 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也难以起步。⁷²这些论述应是全面认识前后 30 年关系的重要指导,也为学界大多数学者所认同。

萧冬连(2013)认为 1949 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路径经历了五次选择,即实行新民主主义、效仿苏联模式、追寻赶超之路、发动继续革命和转向改革开放。这五次选择呈现两个过程,即从走进传统社会主义(或称苏联模式)到走出传统社会主义。前四次选择是传统社会主义内在的逻辑自然演进,第五次选择则具有根本的转向意义。⁷³作者力求每一判断都立于可靠坚实的材料之上,着重于发掘历史本身的逻辑,而不是做简单的道德和价值评判。

二、整体论观点的代表

这一观点主要体现于吴波(2010)对国内外相关观点的提炼与总结。他认为割裂新中国两个 30 年并作简单片面的评判,会使中国模式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进入误区,对于中国模式的认识和把握,需要基于新中国 60 年的整体性视野。基于整体性的视野,在新中国 60 年的历史框架中正确评价前 30 年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是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中国模式的前提。正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最先提出了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的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重大课题,这一历史时期对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模式所进行的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提供了物质基础、理论基础和经验基础。吴波在文中表明整体性的观点非他一家之言,而是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共识,其中也包括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意大利社会学家乔万尼·阿里吉、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等人。这一派学者达成的共识是:形成于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模式是继承性和

⁷² 朱佳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9 年第 1 期。

⁷³ 萧冬连:《国步艰难: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

创新性的统一。有意或无意将两者对立或者割裂开来，必然会造成我们在认识和把握中国模式上出现严重的偏差。中国模式不是对前 30 年道路的改弦易辙。无视这一模式的历史渊源和继承性因素，一味将其中基本内涵全部视为创新的产物，这样做的结果并不能赋予中国模式以更多的光荣。如果忽视了继承性，既难以为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属性正名，也难以获得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的机会和可能。创新如果缺乏这一依托，就可能距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远。当然，中国模式的创新性是显而易见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如果不能正确看待这一模式的创新性因素，就难以客观地对待前 30 年探索中存在的问题，就无法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探索的历史必然性，也就不可能获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现实原因和根据。⁷⁴

武力（2010）则主张从更宏阔的视野看待前后 30 年的关系与发展，认为“新中国 60 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历史，应该放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中去看，应该放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中去看，应该放到中国从 1840 年鸦片战争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到 2049 年新中国实现现代化的 200 多年历程中去看。”⁷⁵

三、专题性研究的代表

随着对前后两个 30 年关系研究的推进，从专题性研究入手的成果也越来越多。有学者对建国后两个 30 年中人的解放进行了专题研究，通过人的解放的主体、内容、层次比较，反映了前后 30 年的巨大变化。⁷⁶贾国雄（2014）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了专题研究。认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的经济发展虽然各自特色鲜明，但经济发展的目标与战略部署都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富强梦”这一历史进程之中，改革开放前三十年重在资源积累的经济发展为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经济起飞创造了条件，而改革开放前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质上都属于国家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二者之间的演进一脉相承。⁷⁷有学者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来探讨两个 30 年的关系。⁷⁸赵伟（2009）从现代化的视角比较两个 30 年的关系，认为前 30 年政治目标压倒经济目标，后

⁷⁴ 吴波：《中国模式与两个 30 年》，《光明日报》2010 年 11 月 23 日，第 9 版。

⁷⁵ 武力：《从二百年的大视野看新中国六十年经济发展》，《中共党史研究》2010 年第 5 期。

⁷⁶ 朱松利、许玫：《建国后两个三十年当中人的解放比较及结论》，《党史博采》2010 年第 3 期。

⁷⁷ 贾国雄：《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8 期。

⁷⁸ 张正光、何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49-2009）：两个“30 年”的比较与启示》，《理论导刊》2009 年第 4 期。

30 年强调经济目标和民生改善，两个 30 年的现代化之路迥异，也都付出了巨大的成本。⁷⁹李正图、李明忠（2009）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与贫困的消除为切入点对前后 30 年进行了比较。⁸⁰张洵（2011）通过对《论十大关系》和“科学发展观”的逐项比较，阐述前后 30 年的前后接续、高度统一关系，前 30 年为后 30 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后 30 年是对前 30 年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81

四

剖析改革开放前后两个 30 年的关系，不只是要关注“断裂和连续”与“肯定和否定”等基本的判断，更要分析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以及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分期；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进程；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等领导人和领导集体的评价；对两个时期中具体实践特别是“文革”和改革开放等的评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走向特别是未来 30 年的发展趋势等。而要分析这些问题就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认识到改革开放前后的 30 年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要处理好社会主义实践探索在不同阶段的关系，把党和人民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深入研究前后 30 年的关系，必须从史实与实践出发，有针对性地抓住重点难点，这主要从三个方面去突破。

一是正确认识党在前 30 年取得的成就和出现的错误失误。这一时期，曾发生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失误和错误，但应该看到党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失误、错误，是历史长河中的片段和支流，不能把这些错误与整个时期等同起来。即使在“大跃进”时期及“文革”时期，我们也还做了许多其他事情，取得了巨大成就。习近平同志在谈到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二是正确认识后 30 年取得的成就和出现的矛盾问题。在改革和发展进程中，什么时候问题都不会少。老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出现；“发展起来以后

⁷⁹ 赵伟：《新中国现代化：两个 30 年之比较》，《学习与时间》2009 年 10 期。

⁸⁰ 李正图、李明忠：《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与贫困的消除：两个三十年之比较》，《学术月刊》2009 年 8 月。

⁸¹ 张洵：《从〈论十大关系〉和“科学发展观”的比较中看新中国两个三十年》，《新西部》2011 年第 12 期。

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许多问题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我国工业化、现代化所处的发展阶段有着直接联系。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出现是我国发展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发展在几十年走完西方国家二三百年的时间，西方国家在二三百年发展中渐次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在我国几十年的时间里可能集中出现。同时，我国作为 13 亿人口的大国，其工业化、现代化的规模是任何西方发达国家无法比拟的，这也是矛盾和问题可能较多的重要原因。但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并没有出现一些西方国家工业化时期矛盾、问题那么突出和尖锐的情况，也远比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矛盾和问题解决得好。这些都说明，我们党作为社会最先进的力量，是能够领导并不断推进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我国的制度体制从总体上是与我国的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决不能以出现矛盾和问题为由否定改革开放、回到封闭僵化的老路上去，甚至否定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

三是要注重新中国 60 年来地方的探索与实践。虽然从宏观层面而言地方都是按照中央的精神和指令进行实践，但在具体执行中又有根据地方特点而进行的探索，甚至有些地方的经验上升为国家政策，这一点在以往前后 30 年关系的讨论中是忽视的，如果仅从国家层面来论证两者的关系，就不能充分解释为什么在国家出现失误与错误的过程中，许多地方还能保持正常的发展与人民生活。

总之，改革开放前后 30 年关系的研究，不仅是中国当代史的焦点问题，也是现实政治的风向标。理论研究必须通过历史的过程去实证，而实证又必须有要素齐全的辩证逻辑联系。